

文化周刊

中华读书报

第430期

13

■本版编辑:赵晋华 ■电话:010-67078073

■E-mail:dushubao@263.net 2018年12月5日

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周国林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在他辞世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他的学术成就愈益受到学界重视,尊之为20世纪后期屈指可数的国学大师之一。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际,人们对前辈学者国学论著研习的热忱大增,也许有人会发问:大师是怎样炼成的?当今还能产生像张舜徽先生这一类型的大师吗?读过张先生的《壮议轩日记》,心目中自然就有了答案。

张先生在青壮年时代,一门心思扑在学问上,勤于动脑动手,写下大量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是他学术探索的宝贵记录。可惜身处战争年代,他南北颠沛,笔记大多毁于战火,手头无一部日记保存下来。幸亏苍天有怜恤之心,不忍尽丧斯文,使部分流散的日记为湖南图书馆所收藏。1984年,张先生收到湖南图书馆所寄四册日记底本,“省览之下,百感交集”。他在给湖南图书馆的回信中说:“早年日记,流散在外者多,此特其残存之一小部分耳。”参校前后,“定为讲学湖南者三册,讲学兰州者一册,各为题其名次于每册扉叶以便保存。”原来,他在1940年代以“壮议轩”为斋号,这四册日记写在专用稿纸上,是他这一阶段学习和生活的记录,容易辨识,失而复得,自然大喜过望。具体说来,前三册写于1942年至1944年冬,是他在国立师范学院、北平民国学院任教及躲避日本侵略军于宁乡、湘乡时的经历;第四册写于1946年月至1947年4月,是他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时的经历。也就是说,《壮议轩日记》缺了1945年至1946年8月以及1947年元至1949年的记录,是个残存本。尽管如此,仍然可以从中间观察到大师成长的足迹,弥足珍贵。

爱日以学 如饥似渴

从1932年开始,张先生先后在湖南长沙市的几所中学任教。虽然因为日军进犯而四处迁徙,但他从未放松学术上的追求,由此名闻遐迩。1942年,受钱基博、马宗霍二位前辈学者之邀,他来到位于湖南安化县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其时,他年岁刚过三十,已立下学术上的远大目标,这从他采用“壮议轩”斋号可见一斑。按“壮议”二字出自《大戴礼记·曾子立事》,意谓壮年阶段有所议论才算得上有业之人。他在1942年11月3日的日记中说:“去秋三十已满,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如斯,因取《大戴记》之语,名所居曰壮议轩,以期朝夕省惕,庶几免于无业之讥。”(以下凡引《壮议轩日记》量仅括注书写时间)

目标既定,立即付诸诸行动。到达蓝田的第二天下午,他就前往

学院图书馆浏览,虽对图书陈设寥寥大失所望,仍“随取书翻阅,俞曲园书数种,假之以归”,“夜阅《蒲柳述林》至二更后”(1942.9.25)。紧接着几日的日记,又有“夜阅《白华前稿》”“阅《白华前稿》颇有悟”“夜阅《铁桥漫稿》”之类的记载。在他1942年10月7日的日记中,有如下一段话:“朝食后赴图书馆,欲从假《东都事略》《续通鉴长编》《系年要略》《辛辅编年录》《三朝北盟会编》,皆无之。自《宋史》外,惟假得毕氏《续通鉴》及《宋史纪事本末》二种耳。居此穷乡,求一常见书不能得,虽日饮酒食,无以疗饥渴。此吾所以发愿于乱定后作十年漫游也。”

在穷乡僻壤借书不易,竟使他产生即使酒足饭饱也“无以疗饥渴”的感觉,发愿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作十年漫游。果然,1946年到兰州后借书条件大为改观。如当年10月26日的日记写道,上午派人到甘肃省立图书馆借《受祺堂文集》《二林居集》《亦有生斋集》等十种书,“俱取以来,自此闭门兀坐,足以疗饥,十日之内不需他粮矣。”闭门家中坐,以书为粮食。昔人称“嗜书如命”,亦不过如此。他对这种天天有书读的生活,十分满足。11月8日,他给昔日学生王石波写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学生“寄情卷轴,尚友昔贤”,他是这样说的:“自来兰州甫四十日,穷朝夕读吾所应读之书,又已逾二百卷。闭门谢客,日课极严,汲汲孜孜,惟日不足,所得亦益以宏富。使吾而处京沪四达之区,耳目炫乎纷华,心智荡于征逐,而能专意致思若此乎?”在他看来,即便生活环境差一点,只要能专心读书,那就是有福之人。

张先生读书中的享受是精神层面的,过程却不轻松。每天读书,他都要进行总结、归纳,并加以提炼。比如,他一连几天阅读清人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做了大量的摘录工作,将若干精彩的段落分门别类抄写在日记中,不时予以评论。针对清人关于宋代程朱之学与陆九渊之学的争议,袁枚认为“士幸生宋儒争定之后,宜集长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助一家攻一家。今有赴长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骑行,其主人之心,不过皆欲至长安耳。苍头仆夫各尊其主,遂至握手嚷骂,及问其路之曲折,而皆不知也。今之排陆王者此类也。”对此,张先生大加赞赏:“此段平章之论最为通适,因近取譬,尤足解门户之争,并时学人知此者稀。简斋天资绝艳,故议论多惬意。”(1942.11.18)又如,他花几天工夫读完郭嵩焘的《养知书屋集》,对郭嵩焘的生平事迹、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了然于胸。在对郭嵩焘的论述做过大量征引后,从其对湖南前辈学者罗泽南身处贫苦时坚

贞事迹的描述,将两人放到湖湘学派的源流之中综而论之:“两公好学无数,不以贫病忧患动其心,艰苦卓绝至于如此,乃天地之至文也。具此真学问真精神,胜于诘屈说字者万万,虽无经说何害?湖湘学者之伟绝处在此,其所以异于江左者亦在此。”随后,又结合时代需求表达弘扬湖南学风的意义:“时举此及为门言之,冀以恢宏其志气,致经世之效。后生闻余言,亦多激昂自兴起者,光大湘学正今日事,笔勉图之,没身而已。”(1942.12.17)

读书时动脑又动手,虽然进度稍慢,但看、读、写、作相连,一步一个脚印,能替日后研究打下基础,长久坚持收获必大。张先生将这种肯下笨工夫的做法,称作“十驾孟晋”。按“十驾”语出《荀子·劝学篇》“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孟晋”语出班固《幽通赋》“孟晋以逾群兮”,皆有锲而不舍之意。张先生既取此语以教人,亦用以励己。如当学生考试成绩不合格时,即“招之人室,勉以十驾孟晋之意”(1943.1.27)。而在接到姐夫余嘉锡先生的来信,看到姐夫的称呼之语,当即立下誓言:“自今以往,吾当自刻厉,十驾孟晋,以期不负长者殷勤之望。”(1942.3.12)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和事例,一再出现在《壮议轩日记》里面。

循序渐进 长计远虑

从日记中不难发现,张先生读书做学问很有计划性。他曾说,读过张之洞《书目答问》中“由小学入经学,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其史学可信”一段话后,恍然领悟到做学问是有次第步骤的,不可骤等。故在早年,他在文字、音韵、训诂学上着实下了一番工夫。年过二十,就该在经史上花气力了。日记中,时常可见到他关于“经史有用之书”“经史根原之地”的说法。他回忆说,少时气盛,立志在三十岁前把二十四史读一遍,凡唐以前正史都遍加丹黄,无一字跳脱,却因战乱转徙而中辍。到了蓝田,他决心读完以下正史。“今税驾此邦,略无尘俗之扰,爱日以学,期竟前功。所宜汲汲从事者,其《宋史》乎?余近来思研穷宋学精蕴,尤非通知其史事不可,期以一年尽心以治之。”(1942.10.6)为此,他尽量搜罗宋代史书,与《宋史》对读,每天皆有一定的任务,即所谓“日课”。“定读《宋史》为日课,虽百帖不可间断。昔归熙甫深于此书,钻研不替,集中有《宋史论赞》一卷,每言‘人患《宋史》多,我患其少’,此通人之言也。余治此书,当听夕奉斯言以自厉。”(1942.10.21)由于“严立课程,如幼童时读书景象”(1942.10.22),张先生终于在1944年即33岁时通读完全史,写出札记数十册(见其《回学释存》序)。

除了学术部类上的循序渐近,

对一些大部头的子部集部典籍,他也有计划地系统阅读,积累见识。如严可均所辑746卷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帙浩繁,他在蓝田时已经大体翻阅过,而将其与一千卷的《全唐文》放到一起研读,是1946年冬至1947年春,也是日有定程的。有一天的日记写道:“夜读《三国文》尽数卷,以补今日日课。”(1946.11.14)盖此日的《壮议轩日课》中,保留着不少阅读《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心得,有的论述相当精彩。如对东汉学者桓谭的文章,张先生赞不绝口,说是“如饮醇醪”。在引录桓谭“殷有三仁,皆暗于前而章于后,何益于事,何补于君”数语后,大发感慨:“此高识之论,非世俗腐儒所能梦见。余尝求之故书,若此三仁,殆所谓确仁者也。”《韩诗外传》卷一曰:“仁道有四,确为下。有圣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确仁者。廉洁直方,疾乱不治,恶邪不正;虽居乡里,若坐涂炭;命入朝廷,如赴汤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不尝;疾乱世而轻死,弗顾弟兄;以法度之,比于不祥;是确仁者也。”《外传》此释,又与《荀子·不苟篇》相表里,所谓“非礼义之中,君子不贵也。”余平生持论,极服荀荀卿不苟之说,往为后生讲《礼记·中庸篇》,至“素隐行怪”一章,畅发斯旨,至为详尽。英奇之士,亦各有所发悟。盖此理不明,则德性不能坚定,大而影响政教,小而及于一身,非细故也。”这就将某一个人的观点同思想史融会贯通了。这种贯通性的读法,日记中还有很多。令人惊异的是,把这些幸存下来的日记同张先生数十年后出版的《读文札记》对比,文字竟然基本相同。这表明,日记中的心得已是深思熟虑的学术成果,按照一定的体例组合为文,只需要简单的追录和适当的文字调整,这不能不说读书与作文之间最便捷的通道。

在循序渐近的治学过程中,张唐以前正史都遍加丹黄,无一字跳脱,却因战乱转徙而中辍。到了蓝田,他决心读完以下正史。“今税驾此邦,略无尘俗之扰,爱日以学,期竟前功。所宜汲汲从事者,其《宋史》乎?余近来思研穷宋学精蕴,尤非通知其史事不可,期以一年尽心以治之。”(1942.10.6)为此,他尽量搜罗宋代史书,与《宋史》对读,每天皆有一定的任务,即所谓“日课”。“定读《宋史》为日课,虽百帖不可间断。昔归熙甫深于此书,钻研不替,集中有《宋史论赞》一卷,每言‘人患《宋史》多,我患其少’,此通人之言也。余治此书,当听夕奉斯言以自厉。”(1942.10.21)由于“严立课程,如幼童时读书景象”(1942.10.22),张先生终于在1944年即33岁时通读完全史,写出札记数十册(见其《回学释存》序)。

除了学术部类上的循序渐近,

后来若干清人著述研究,实际上就是以此为起点。

尤其难得的是,他在30岁左右形成的一些研究课题,他将其作为终身的研究对象,矢志不渝地去努力完成。见过陆世仪《思辨录》中“续经”之议后,他服其见识之卓,联想到眼下,以为“今日所宜从事者有三焉,修通史一也,纂诗史二也,续修《通鉴》《通考》而汰其不切于今日者三也”(1943.1.13)后来他读了马一浮的《复性书院简章》,对其编纂计划有所议论,且谈到自己的计划:“余旧有志撰集《经子粹语》《史传简编》二书,以为振民育德之助。”(1944.4.7)这两段话中的“修通史”“撰集《史传简编》”,都是指的普通民众能够读懂的简明通史。他一生念兹在兹,终于在40多年之后写出《中华人民通史》,于1989年问世。至于第二段话提到的《经子粹语》,他勤于辑录,在晚年定稿为《经传诸子语选》,后由其子女编入《霜红轩杂著》中。学术研究中的这种连贯性从末间断,也使他始终掌握着自己科研项目的主动权。

博观约取 自出机杼

人至壮年,学术基础大体奠定,对其后的发展方向总会加以盘算,张先生由其学术背景所决定,走的是博通的治学之路。博到什么程度?刚到蓝田不久,他有一段博学之辨:“唐宋以来,说部之书充栋汗牛,学者稍涉其藩,自可益人意智,若专攻逐于此,则舍本逐末,不能静心读一部经史有用之书矣。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其不可恃甚明。故守约之外偶资博文则可,以学问之大,不在乎此而从事焉,不可也。吾又以为,博之与杂,其辨至严。不博则如始终整齐一室,而不览天下山川之美;若涉于杂,则终身彷徨道路,而绝无一日室家之安。近人乃多以杂为博,失之远矣。”(1942.9.30)他强调博通要在经史上下工夫,这样就如同游览山川归来有个家,否则就会没有落脚点。为此,他采纳顾炎武“诗不必人人皆作”的说法,放弃了诗词创作的爱好。日记中,保留着他在这方面给予朋友的劝告之语(1943.1.7)。

到了兰州,张先生遇到了一群志趣相投的学者。有一天,他与杨朗明教授谈到治学精神贵乎猛进不懈时,杨言“欲成大师,必具学不厌悔不倦之精神,徒力学而不能勤诲人祇能成专家,不能成大师”,说得藉以考镜三百年间学术迁革,得失义例早定”,虽以涉览未周没有立即动笔,但原来所作文章、翁方纲网络的论述做过大量征引后,从其对湖南前辈学者罗泽南身处贫苦时坚

贞事迹的描述,将两人放到湖湘学派的源流之中综而论之:“两公好学无数,不以贫病忧患动其心,艰苦卓绝至于如此,乃天地之至文也。具此真学问真精神,胜于诘屈说字者万万,虽无经说何害?湖湘学者之伟绝处在此,其所以异于江左者亦在此。”随后,又结合时代需求表达弘扬湖南学风的意义:“时举此及为门言之,冀以恢宏其志气,致经世之效。后生闻余言,亦多激昂自兴起者,光大湘学正今日事,笔勉图之,没身而已。”(1942.12.17)

读书时动脑又动手,虽然进度稍慢,但看、读、写、作相连,一步一个脚印,能替日后研究打下基础,长久坚持收获必大。张先生将这种肯下笨工夫的做法,称作“十驾孟晋”。按“十驾”语出《荀子·劝学篇》“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孟晋”语出班固《幽通赋》“孟晋以逾群兮”,皆有锲而不舍之意。张先生既取此语以教人,亦用以励己。如当学生考试成绩不合格时,即“招之人室,勉以十驾孟晋之意”(1943.1.27)。而在接到姐夫余嘉锡先生的来信,看到姐夫的称呼之语,当即立下誓言:“自今以往,吾当自刻厉,十驾孟晋,以期不负长者殷勤之望。”(1942.3.12)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和事例,一再出现在《壮议轩日记》里面。

循序渐进的治学过程中,张唐以前正史都遍加丹黄,无一字跳脱,却因战乱转徙而中辍。到了蓝田,他决心读完以下正史。“今税驾此邦,略无尘俗之扰,爱日以学,期竟前功。所宜汲汲从事者,其《宋史》乎?余近来思研穷宋学精蕴,尤非通知其史事不可,期以一年尽心以治之。”(1942.10.6)为此,他尽量搜罗宋代史书,与《宋史》对读,每天皆有一定的任务,即所谓“日课”。“定读《宋史》为日课,虽百帖不可间断。昔归熙甫深于此书,钻研不替,集中有《宋史论赞》一卷,每言‘人患《宋史》多,我患其少’,此通人之言也。余治此书,当听夕奉斯言以自厉。”(1942.10.21)由于“严立课程,如幼童时读书景象”(1942.10.22),张先生终于在1944年即33岁时通读完全史,写出札记数十册(见其《回学释存》序)。

除了学术部类上的循序渐近,

究览,是之谓博;无宗旨、无归宿,遇书辄看,记问馱多,是之谓杂。学不博则陋,学太杂则苦。譬之出处必先有庐舍园池,而后周游天下以穷耳目之胜,晚岁归来始有室家之安。苟自少而无乡井之托,终身荡游于外,见闻固已周矣,投老竟无所归,此杂之害也。由博返约,其成功易;泛滥无归,未见有能成功者。”(1946.12.10)以有无“室家之安”为博杂的区别,这同在湖南讲学时比喻相同,但增加了有无宗旨、归宿的因素,认识明显大为提升。两天后,又为思及成家之学夜不能寐,结论是“必有别择有去取,而济之以独断之识,方能卓然树立,不拔不挠”(1946.12.12)。随后,又在解说南朝人颜延之“观书贵要,观要贵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之语时,评议“此言足为万世治学者不易法门”,作为自己“无宗旨、别择不得为成家之学”认识的理论依据。

对成家之内涵的思考,促使着张先生个人研究特色的形成。在论及学、文之关系与自己的取舍时,他明确地表示:“吾之治学自为家法,亦即善取其大略,而不粘求一字。”(1946.11.16)在提出自己讲学宗旨以发越志趣为首时,也自信地说:“吾自有吾家法,正不必要途人而同。”(1946.12.9)关于这一“家法”,他在用五个月时间读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后有如下阐发:“余近年观大部书,每以苏子瞻八面受敌法求之,往往有得。苏言本施之治史,余则以读天地间一切书籍,余如是。余平生为学,于精习之书,用心至细,工夫至密,《三礼》《毛诗》《尔雅》《说文》是也。涉览之学,则但通其大略,而不粘求一字一句之末,若此类书是也。然过目辄能举大旨,明得失,以类统宗,操简驭繁,此殆他人所不能学也。非特不能为一家子姪法,并不足为及门诸生法也。”(《旧学辑存》卷下第1605页)正是凭着这一家法,张先生在“壮议轩”阶段读书得间,成果丰硕;更是在随后数十年中沉潜书卷,著述宏富,在全国首建历史文献学学科。钱基博先生早年预见他“异日必享盛名,足以自开学派”(1946.12.28),岂空言虚语哉!

《壮议轩日记》内容丰富,包含张舜徽先生家庭生活、学术研究、社会交往及见闻各个侧面,非一篇短文所能全面叙述。以上仅从张先生读书之勤奋专注、步骤之缜密长远、格局之博大独特三方面,依据日记所截来展现他壮年时期的治学历程。因本人理解尚浅,难免多有遗漏,仅供热心国学研究、关注现代学术史者参考而已。欲知精蕴如何,且请开卷采获。

《壮议轩日记》张舜徽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墨学能否现代化与全球化

■解启扬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全球化,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重大课题。最近,《墨学:中国与世界》(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出版,就是聚焦墨学现代化与全球化这一时代课题的学术成果。

当代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现代化与全球化。全球化的时代,对墨学发展是挑战,也是机遇。现代化的文化要求走出传统,面向未来。全球化的文化要求打破封闭与孤立,融入世界,多元并存。站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视野来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墨学,应该知道,未来的墨学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关于墨学的民族性问题。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必须考虑民族文化的绵延问题。近代以降,古今中西在中华大地上激荡澎湃,墨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面临现代化的挑战与选择。该如何发展墨学,是摆在知识人面前的时代课题。在此,摆反对两种非此即彼的态度,一是极端

的文化保守主义态度,认为现代化给民族文化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使得民族文化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拒斥现代化,主张回归传统。这种观点认为,在先秦墨家思想中,已经具有了解现代文化所带来的问题的文化基因,回归先秦墨学即可化解现代化产生的各种文化问题。这种文化态度是僵化的,任何一个文化的产生都受到时间与条件的诸多制约,墨学也不例外。

另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而现代化是工业文明,因此,墨学与现代文明不相容,应该抛弃传统墨学,拥抱现代西方文化。这种观点看到了文明的共通性,却忽略了文化的差异性。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根,根深才能叶茂。墨学虽然发端于先秦,但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民族文化的根系之一,割舍不断。况且墨学具有开放性的特征,昌明墨学,融化新知,就是对墨学的核心观念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在诠释中吸纳世界文明的有机营养,做到返本开新,

成为现代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事实上,现代思想家胡适先生在《先秦名学史》导论部分就曾经提到过类似的问题。在胡适看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联结起来,墨学中能够找到联系现代欧美文化的合适基础,从而产生一个新的文明系统。胡适笔下的新文明系统就是墨学的创造性重生。

曾有学者提出新墨学,大概是因应儒学出现新儒家及其在当代文明,因此,墨学与现代文明不相容,应该抛弃传统墨学,拥抱现代西方文化。这种观点看到了文明的共通性,却忽略了文化的差异性。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根,根深才能叶茂。墨学虽然发端于先秦,但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民族文化的根系之一,割舍不断。况且墨学具有开放性的特征,昌明墨学,融化新知,就是对墨学的核心观念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在诠释中吸纳世界文明的有机营养,做到返本开新,

解释,而是融汇现代理论,对墨学进行创造性诠释,是墨学发展的新阶段、新形态。墨学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为新墨学的诞生提供了核心理念的基因,现代文明的理论为新墨学的产生提供文化内容。这不正是胡适对墨学的期待吗?

作为现代文明的新墨学,反对墨学本位文化,因为现代中国的文化不可能是某某派思想的单一性文化,任何单一性文化构想都可能阻碍中华文明的发展。所以,新墨学持开放包容文化情怀,与现代儒学等文化思潮不是对抗的,而是多元并存,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墨学也应该是世界的,这是全球化的要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希

望。”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由于西方社会经济与科技的暂时强势,一些人以为全球化即西方化,文化上应该广泛输入西方文化,这种观点显然是对全球化的中国定位的误解,也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全球化是经济交流与文化的广泛交融,呈现多元多样的形态。墨学需要直面西方文化的挑战,作为回应,以兼爱为内核的墨学持开放包容,吸纳西方文化与现代文明中的有价值成分,实现墨学走向世界,为世界文明做出中国贡献的时代。

早在近代,就有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墨家的兼爱理论与基督教的博爱具有相通之处,只不过,当时囿于文化情感,认为基督教的博爱源出墨子的兼爱。一个多世纪过去,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基督教文明的博爱与现代世界的文明内核之一,成为现代文明对人类作出了贡献,虽然两者之间有一定的不同。博爱是神性的爱,根源在于造物主上帝,造物主是爱受造者,是受造者之间彼此